

《色，戒》：旗袍与万丈裹脚布

川沙

李安本人和好多文章都说，张爱玲写《色，戒》写了几十年。其实，应该说她“思考”和“沉淀”了10年，或许揣摩一下她的心理状态，不妨说是她等待时局的变化等待了10年，才将这个短篇——涉及到她自己的政治恋情、文字本身只需要一个晚上的功夫——小说完成。与其说《色，戒》写得含蓄、留白、或者富有张力，不如说写得暧昧、点到为止。之所以如此，是和作者本人内心的晦涩、灰暗、“欲说还休”相关，这是个人的看法。

张爱玲作品对人性的剖析是拿手好戏，她善于洞察人性的细微和险恶，以及她的才情，都有目共睹。但是，她的率性、过分依赖自己的感觉，没有脱离一些平庸小女作家的通病。从小说本质是讲故事来说，她的一些作品还欠完美，谋篇布局、形式及结构等方面，都还存在缺陷，社会生活、更大场景的描写、情节的铺垫、人物命运的展开，都还值得商榷，显得不够丰满和力不能逮。她的《秧歌》写到土改的时候，更是凭空臆造。

1961年，美国夏志清的英文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挖掘”出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等人。自此，海外的研究开始看重张爱玲的作品。但是，对比阅读象陀斯妥耶夫斯基、莫泊桑、爱伦·坡、卡夫卡这些世界级经典作家的作品，她还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张爱玲热衷处于世俗和在其中无助者的体验，因此，赢得读者的共鸣。张爱玲对人生病态的体验，她以病态目光发现和表现这些“时代沉落中”的众生相。毋容质疑，这些都是她的特点。文坛有张爱玲自然色彩更加斑斓，而且张爱玲作品改编电影也无可厚非。张爱玲这样带有病态的、“看破红尘”的作家能长时间赢得众多读者的痴迷，对我们当代社会心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讽。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由李安来改编成电影。李安在电影界崛起于《断背山》，他凭此片2006年赢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李安最早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是从《喜宴》开始。这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电影，在1993年让他拿下柏林影展金熊奖。随后李安转赴好莱坞发展，以英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理性与感性》一举入围7项奥斯卡，并再次拿下柏林金熊奖。接下来的两部作品《冰风暴》与《与魔鬼共骑》，却都叫好不叫座，直到2000年的《卧虎藏龙》横扫全球影坛。

1900年代由洛杉矶郊外荒凉小村发展起来的好莱坞电影城，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神话般地崛起了一座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的电影城，它不单是“美国电影”的代名词，更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同义语。成为影响世界文化、经济甚至政治的文化现象。据说，在好莱坞电影城，一部电影完成之前，会有好几种版本放映给不同年龄段和文化层次的观众观看，然后抽样调查票房的最大化。所以说，好莱坞电影是“工业产品”的说法真是名符其实。然而，工业化就是非个性化。商业法则和工业化力量，渗透在好莱坞制片、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制片活动中。制片，是好莱坞电影工厂的核心部门，也是决定好莱坞财源的关键部门。为了达到最大的利润，制片者们把他们精通的商业之道全部灌注在了作品制作中，从而创造出了好莱坞特有的电影文本制作方式——配方式生产。

一方面极力迎合观众的观看需求，另一方面研究、揣摩观众的观赏趣味，逐渐形成了许多定型选材、立意及表达方式等因素，将它们按照不同的方式搭配，

就构成了一部部具有商业价值的电影。

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新好莱坞”电影，就是这样一个产物。

李安的作品，大都是在这种文化下的产物，对比中国古典小说中《金瓶梅》、《牡丹亭》、与《红楼梦》里那些隐喻生动的含蓄而言，李安的《断臂山》也好，《色戒》也罢，里面那些赤裸裸滚动颤抖的肉块，显然少了些遐想和百看不厌的回味。王佳芝和易先生在床上那些一丝不挂的高难度的动物本能动作，哪里比得上《西厢记》里张生和崔莺莺两人水袖子一搭、眉目传情一番，那里面包含着的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张生见到容貌俊俏的崔莺莺时，那句“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里的意犹未尽，又岂是《色戒》里，汤维换穿着的27件旗袍所能够表达穷尽得了的？

大众娱乐引导消费时尚，李安的贡献在于，《色戒》放映后，倒是让中国旗袍的复古在今天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家大门、西学东渐或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大大地发扬光大了一番。

随着早期欧洲自然主义文艺观的出现，在欧洲，电影里的裸露镜头已经由日渐出现到见惯不惊，成为很正常的事情，就如一个人吃喝拉撒一样，没有什么人会大惊小怪。《色，戒》在亚洲大热，评论之声一浪盖过一浪，政治家、艺术家、道家、电影观众和文学票友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在笔者看来，这情景有些象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在他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里描写200年前的1793年7月，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央帝国”的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的情景一样。当那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到达天津大沽口时，满街的“盛世”子民都上去围观队伍中的两个黑人。“那都是人吗？”，于是乎，他们中的一些人上前去触摸，一些人瞪眼观看，一些人吓得抱头奔逃，一些人用木棍去敲打……“那都是人吗？”立时传遍大街小巷……

《色戒》里的两个裸体的男女，就是当年的那两个黑人。

1971年，先后在第五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和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的佩雷菲特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他出版了《当中国觉醒时……》一书，现在看来，当下对《色戒》的评论，正好应了他在书中对中国的一些预言。

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期间，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伯兰特·罗素应邀在中国讲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列强欺侮的时代。罗素在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北京、上海等地讲学回到英国之后，在英国各大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1922年，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他在书中写道：“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

“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温文而雅，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类快乐。”

“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

罗素乐观地《中国问题》一书预言说：“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

李安以典型的美国好莱坞方式拍摄了电影《色，戒》，但是，里面的故事，人物、对白、语言、道具、场景无一不是中国元素。

李安的贡献是用西方人的“先进”手段来发扬光大了中国文化。《卧虎藏龙》里，李安宏扬的是中国的武侠文化，《色，戒》里，却是清末民初的“旗袍文化”。这是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现在的所谓第五代导演们正在遗忘和丧失的东西。

《色，戒》的大热，也正好合上了中国性解放的大潮。从某种角度而言，性解放在积极的意义上，实际上是人性的解放。美国是在 1960 年代，中国迟了半个世纪。因此，《色，戒》不热都得热。这或许是李安的商业眼光，或许不是。但是，结果是它热了。另外的一个附带的后果是，旗袍也热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满族人宫廷里古老的旗袍开始走出来在上海和西洋文化结合，旗袍的开岔由单侧渐渐变为双侧，由低处的小腿上升到膝再至大腿最后及臀部，人们的想象力也开始节节攀升……

《色，戒》的正面意义在于，它在突破着中国传统观念里电影文化的性尺寸、同时引来中国传统性道德观念的困惑时，也在宏扬光大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条千年缠绕着古老中国的万丈长的裹脚布，正在缓缓松开……